

DANGDAI ZHONGGUO SHISHI LUESHU

当代中国史事略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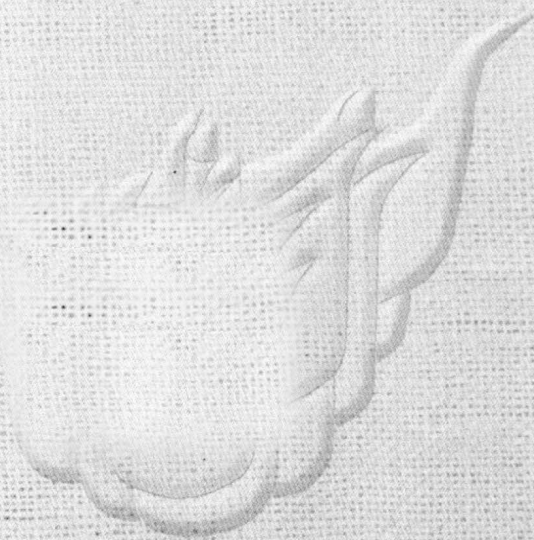
杨树标 梁敬明 杨菁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史事略述

杨树标 梁敬明 杨 菁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史事略述 / 杨树标, 梁敬明, 杨菁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7

ISBN 7-213-02471-X

I. 当... II. ①杨...②梁...③杨... III. 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IV. 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994 号

当代中国史事略述

杨树标 梁敬明 杨菁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 责任编辑 石英飞
- 装帧设计 王义钢
-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杭州市玉古路 20 号)
-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印 张 19 插 页 2
- 字 数 43.8 万
- 印 数 1 - 4000
-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2471-X
- 定 价 32.5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共和国走过了五十多个年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却是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普希金说过，一切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回忆。我们想，亲切的并非都是欢乐的，当然也包括痛苦的。共和国五十多年历史就是如此。共和国史有过不少教本，普遍的是读起来较为枯燥，大概是因为有一套较为牢固的模式的关系。我们想突破一下，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权威性著作拿来作为依据，又参考了许多书，把多年教学的成果汇集在一起，同时在体裁、结构、文笔上活跃一些，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严格遵守写历史的规矩。

目 录

第一章 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	1
一、开国大典	1
二、新的“三大战役”与全国大陆的解放	11
三、“六六文告”	17
四、《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32
五、打退物价飞涨与调整工商业	42
六、抗美援朝	58
七、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82
八、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93
九、清除“三害”与“五毒”	104
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23
十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	135
第二章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144
一、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	144
二、农业合作化与邓子恢问题	155
三、公私合营与“用钱买了一个阶级”	174
四、反对高、饶阴谋活动的斗争	188
五、胡风及其冤案	211
六、打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221

第三章 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233
一、一次很成功的党的代表大会	233
二、批判反冒进、反右派与反“右倾”	242
三、“大跃进”运动	281
四、如何渡过难关?	294
五、中苏大论战	312
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重提阶级斗争	331
七、为什么说“主导方面”是好的?	361
第四章 一场噩梦——“文化大革命”	371
一、两个反革命集团	371
二、共和国主席之死	386
三、值得歌颂的四次斗争	401
第五章 历史的伟大转折	421
一、华国锋纠正不了“左”倾错误	421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	439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	453
四、平反冤假错案	472
第六章 改革开放	483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乡镇企业	483
二、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	498
三、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	506
四、扭转乾坤的“南方谈话”	530
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550

六、“一国两制”与香港、澳门回归	559
七、全球问题与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	575
后记	600

第一章 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

一、开国大典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基本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建国的准备工作。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8月开始，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阶层的人士，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来到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事宜。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这一条例选出了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办理日常工作。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等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筹备

会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 6 个小组,分别完成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政协组织条例,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起草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等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产生,凝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各位代表郑重的商讨和审慎的思考。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原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董必武领导的第四小组在讨论政府组织法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国家的名称问题。许多代表感觉国名太长,用起来累赘,由此提出了三种意见。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 Democracy 来自希腊语,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最后,在修正通过的组织法初步草案中,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代表及各方面有关人士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对国名问题作了解释。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662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会议实际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

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中对原国名及不同意见作了介绍,并对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作了解释: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

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这个意见为政协全体会议所接受。

国家名称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国名的简称问题需要仔细斟酌。这里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原来，由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习惯，在国名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周恩来解释说，中华民国叫了38年，一下子换了，会使政治水准很低的人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许可简称“中华民国”，但这个“中华民国”的性质与过去是有区别的，它不包括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在内。对于这个简称，政协代表中有不同的看法。

新政协主席团对是否取消国名简称采取了慎重态度，特别注意听取当年追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建立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老前辈的意见。为此，9月26日，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革命以来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在请柬上注明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周恩来作为东道主，开宗明义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周恩来这一番开场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延续性的尊重。

东道主开诚相问，应邀者坦诚陈述，大家在午宴的商讨气氛

中畅所欲言，意见基本取得了一致。周恩来最后说，我将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记下了取消国名简称的说明：去掉“简称中华民国”，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民国38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由此，在政协全体会议通过的大会文件中，去掉了“简称中华民国”这几个字。

国旗的确定，是在广泛征求设计图案的基础上产生的。以马叙伦为组长的第6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他们决定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自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同时刊登了新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提出国旗应征图案的3个条件：一要有中国特色；二是要含有中国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要庄严整洁，一目了然。国旗审定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幅国旗图案，在征集来的近3000幅图案中，经过反复比较筛选，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最终把38幅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印发给出席政协会议的每一位代表。9月25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到第五天，按照大会议程，就要通过国旗方案了。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约请各方人士，包括郭沫若、沈雁冰、马叙伦、田汉、黄炎培、张奚若、徐悲鸿、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贺绿汀、艾青等开座谈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等问题。38幅图案环列在会场，各位代表凝望图案，默默思量。著名剧作家田汉看中了第32号

图案,在红色的旗面上,镶有一大四小五颗黄星,顶端有镰刀斧头。他对毛泽东说:这是一幅很理想的图案,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毛泽东认为可以去掉。与会者逐一传阅了该图案后,一致同意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接下来,大家讨论对五星的解释。据《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一书介绍:“有人说,中间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周环绕的小星,代表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几位代表不同意这个意见:四颗星代表四个阶级,恐怕不妥。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了吗?毛泽东发表意见说: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不说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了国旗的议案,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3天之后,在政协会议闭幕式上,怀仁堂主席台上展示了一面精心制作的五星红旗。

同国旗一样,国歌也实行了公开征求。在9月25日的座谈会上,国旗方案很快确定下来。待讨论国歌问题时,会议一时冷场。就在各位代表冥思苦想之际,著名画家徐悲鸿站起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周恩来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作为代国歌是很适合的。接着,又有代表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这首歌。

座谈中,也有代表对《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提出了异议,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全场鼓掌表示赞同。

在9月27日的政协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国歌的议案。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会议还通过了下列四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通过这个决议的这一年为1949年;(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选举周恩来等181人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和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

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政府机构，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定：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3点整，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上的30万人和天安门东侧的东长安街上等待检阅的军队和游行队伍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万岁，万岁！”紧接着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按下升旗按钮，第一面鲜艳的国旗——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接着，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式开始。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检阅陆海空三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军乐曲的奏鸣中，受检阅部队包括两个海军排、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分别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年轻的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也以14架编队在会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检。阅兵式前后历时3个小时，“浓缩了我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也预示了未来的征途”。

开国盛典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协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加速研究和确定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员，以尽快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

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从事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所需要的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最后商定：首先将华北人民政府撤销，以这个班底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在人选问题上，政务院以及下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是周恩来提名，同毛泽东慎重商议后，经政治局审定，再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来是非常重视的。10月11日，周恩来亲赴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家长谈，劝说黄（北洋政府时期黄曾两次拒绝当局任命他为教育总长）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并协商民建其他领导人在政府中的任职问题，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周恩来恳切的话语，使黄炎培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被说服了，但表示还须再考虑考虑。次日晚，周恩来再次登门时，黄炎培欣然答应担任公职。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和正副总参谋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正副秘书长及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员。至此，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组织机构完全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拥有副部级以上人员500名，计：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

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4个委员会（检察、政法、财政、文教委员会）

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 170 人；各部、会、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厅长、副厅长等共 175 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 30 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委员 17 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 14 人；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 5 人。

这样一个大阵容的中央人民政府，其政治基础是由各革命阶层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一战线。这次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任命，经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它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及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广泛的统一战线。如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 7 人中，民主人士即占有 3 名，56 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共产党人士几乎占一半；政务院从总理到委员、副秘书长的 26 人中，非共产党人士占了 14 人。其他各部、会、署、院中，非共产党人士约占 1/3，有的部委占 1/2 以上，并且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当了部长或主任。仅就中央人民政府 21 个部的统计，民主人士当部长和副部长的即达 26 人之多。其中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朱学范、李德全，民主同盟的章伯钧、史良，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民主人士李书城，以及起义将领傅作义，作家沈雁冰、教授梁希等都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部长，他们都有职有权地独立负责领导各自部里的工作。

10 月 21 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布政务院成立，并作《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

问题》的报告。说明：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政务院和它下属的四个大委员会和 30 个行政部门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组建，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科学分工的机构。政府正在草创中，政府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党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三部分人各有长短，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取长补短，加强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的修养，搞好工作。强调：政务院既已成立，各个部门就应制定各自简要的工作条例和组织条例。这样，一方面可以不约束大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同时又可以约束自由主义。^①

至此，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成为伟大的现实，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空前大团结产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前强有力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府中切实负起了领导责任，保证了新政府的稳定性、坚强性和前进的正确性。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贤达和知名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人一道，担起了领导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历史重任。新中国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适应了“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的需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 页。